

# 校勘學概論

東青衫志離俗裁得暢可憐彼兒是吳越件件  
都受取更與你幾件物

會惜俺如玳今戴南海著

是九嶷山下蒼竹當日湘妃別繞貞服兒裡淚

珠淚珠如秋雨點點都画成斑斑

○瑤葉是你咱柳夜間會挑鬪友

醉了上林賦成名也在上都

鎮日家乾酒迷花便把支君不

緒慙孩兒訟路裏耐辛苦若見

# 校勘学概论

戴南海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**校勘学概论**

**戴南海 著**

**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**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书店发行 礼泉印刷厂印刷  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 印张 173千字  
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3,030  
统一书号：17094·37 定价：1.40元



## 序

戴南海同志所著《校勘学概论》即将付梓，要我写几句话，我深感欣幸。

凡接触古籍的人，都知道校勘的重要。清代学者整理古籍有很大成绩，对此已有充分认识。《书目答问》一书自言“为告语生童而设”，其略例指点门径，第一条就说：“读书不知要领，劳而无功；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，事倍功半。”要利用古籍，不可缺少精校精注本，而校、注两项工作之间，校勘又更为基本。

经过精校，即成善本。读古书须讲求善本，所谓善本有两种意义。前代佳槧精抄，曾有名家收藏题跋，是文物意义的善本；近人细心校勘，刊正讹误缺漏，是学术意义的善本。两者都应受到珍视，而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后者易得便读，能包容前者的优长，其益处每每胜于前者，不能因其晚出而轻视。

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讲究古书版本只能是少数人的事，甚至被讥为奢侈。这种情形，今天早已改变了。时有某些朋友说，他是专攻一种学科的，并不研究版本，撰写著作时于此不必着意。这个看法是不对的。事实证明，不少著作中存在的瑕疵，正是没有注意版本校勘的结果。自然，研究特定学科的学者不能人人去做校勘考订的工作，这就要求我们整理古籍，为广大学术界提供在校勘上最好的本子。



黟县朱师辙先生著《商君书解诂定本》，以严万里校本为主，采明以来二十余本参校，“订其异同谬误，择善而从，附于严校之下”，至今仍然是《商君书》最好的一种校本。该书凡例云：“学者读此一本，无异遍读各本。”这正是读者对校勘工作的希望。欲校一书，先选定一个最古或最佳的版本作为底本，广搜各种版本，用各种方法参校，注于底本之下，将所有现象和问题向读者和盘托出，便能为研究这部书提供良好的素材和基础。校本的这样形式，我觉得是值得取法的。

校勘古书，本身也具有研究性质，不仅是机械性的工作。校勘贵有裁断，从而校本的好坏直接体现着校者的才力学识。曾见有的校本，能广征博引，但只平列诸说，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，或缺少明白的倾向，这会使读者无所适从，减低了校本的价值。另外又有个别校本，勇于改动原文，或者杂采异本，随意增删改易，不成系统，这又会使原书失真，其后果是新出现一种不足信据的版本，反增后人重新校勘的麻烦。采用以一本为主，参校众本的办法，可以避免这种流弊。

古籍的整理工作有极其广阔的前途，随着学术的发展，校勘学也在不断进步之中。有人以为古书校勘已经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可做，这不过是误解。

以汉代以上的典籍而言，其种数固然有限，历代学者做过大量工作，但仍有不少空白有待我们去填补。例如子书中的《文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鶡冠子》等，长期以来被斥为伪书，很少人过问，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著述也不涉及，虽然有过几种注本，都很不理想，更没有精校本。近年，考



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竹简《文子》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《尉繚子》，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类似《鹖冠子》的帛书，才为这些子书平反，认识到它们确系先秦旧籍。

以新发现文物运用于校勘，在近代有很重大的成果。敦煌卷子的出现，至今在古籍整理上发挥着影响作用，是大家熟知的。七十年代至今，全国不少地点陆续出土竹木简和帛书，其年代自战国到汉代，数量繁多，内涵丰富，足与历史上艳称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比美。据之整理出来的佚书，无一不是所谓惊人秘籍，有的连汉代刘向、歆父子也未得见，不可不说是今人的眼福。

这些重大发现的意义，还限于佚书本身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亲自见到纸应用以前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。由此我们对古书的产生和形成过程，对古书的构成和体例特点，都能有更深入准确的认识。这对于怎样校勘传世古书，是非常重要的启发。

应加校勘的古籍范围是很广泛的，许多唐以下的书籍还没有人着手过，校勘工作大有用武之地。我曾校点一种明清之际著作的抄本，满目荆棘，殚尽心力，仍不免有所疏失。有的近代作品，鲁鱼亥豕之处更多，也亟需校勘。

关于校勘的原则和方法，戴南海同志本书作了详细论述。南海同志多年工作于图书馆界，到西北大学执教后，又负责于校图书馆。他精于版本目录，尤重校勘之学，在讲授的基础上著成此书，有以金针度人之意。相信每一位读者，都能从这本书中得到裨益。

李学勤

一九八五年七月

# 目 录

序	李学勤
<b>第一章 绪论</b>	( 1 )
第一节 校勘和校勘学	( 1 )
第二节 校勘是整理古籍的基本环节	( 9 )
第三节 校勘的具体功用	( 23 )
<b>第二章 校勘的方式和内容</b>	( 33 )
第一节 校勘的方式	( 33 )
第二节 校勘的内容	( 37 )
<b>第三章 校勘的依据和条件</b>	( 52 )
第一节 校勘的依据	( 52 )
第二节 从事校勘工作的条件	( 69 )
<b>第四章 校勘的方法、态度和应注意的问题</b>	( 84 )
第一节 校勘的方法	( 84 )
第二节 校勘的态度	( 121 )
第三节 校勘应注意的问题	( 129 )
<b>第五章 校记、体裁和序跋</b>	( 140 )
第一节 怎样写校记	( 140 )
第二节 校记的体裁	( 145 )
第三节 怎样写校本的序跋	( 146 )
<b>第六章 辑佚</b>	( 150 )
第一节 古书散佚的原因	( 150 )

第二节	辑佚简史·····	( 158 )
第三节	辑佚的方法和评价佚书优劣的标准·····	( 166 )
<b>第七章</b>	<b>辨伪</b> ·····	<b>( 172 )</b>
第一节	辨别伪书的重要性·····	( 172 )
第二节	作伪的原因·····	( 180 )
第三节	辨伪略史·····	( 197 )
第四节	辨别伪书的方法·····	( 215 )
后记	·····	( 252 )



# 第一章 绪 论

## 第一节 校勘和校勘学

什么是校勘？必须首先从“校讎”和“讎校”叙起，因为“校讎”和“讎校”这两个词，用得都比“校勘”要早。如汉朝刘向《管子序》云：

所校讎中《管子》书三百八十九篇。

校讎二字，字异义同。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刘师培在《国粹学报》释“校”字曰：

校，训木母（母字或误为田，今本作囚，并非。），本横木之称。校讎本字，盖当作榘。《说文》：“榘，敲击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榘，击也。”古籍之文，凡义涉比核穷究者，恒由击义引申。并旁及深掉，以期核实也。榘交同部，故假校为榘，较为校别，作校亦同。是犹榘辜或作较辜，扬榘或作扬校也。

又校亦可作较，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校，户教反字从木。若从手，是比较之字耳。今人多说乱之。”《佩觿》：“较，音教，比也。”用此字者，当以明末为始，明熹宗名由校，因避熹宗之讳，所以清代学者顾炎武（亭林）、惠栋、黄丕烈诸家所校各书，“校”皆作“较”。把“校勘”改为“较勘”。可见校的原意是考核查对之意。如《汉书·食货



志上》：“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”然后再引申为考查书本文字的，也可称“校”，如唐骆宾王《帝京篇》：“校文天禄阁。”

讎字，《说文》：“犹讎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对也。”《正字通》：“言相讎对也。”《韵会》：“讎，犹校也。谓两本相覆校，如讎仇也。”《尔雅》：“匹也。郭注：讎，犹侑等类也。”《方言》：“予赖讎也，秦、晋曰讎。”据上所引诸说看来，是讎字有角比检考之意，与校可以互训。

合校讎以成词，大约是起于西汉之世。《御览》卷六一八引刘向《别录》说：

校讎：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，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冤家相对，为讎。

据此，则不但校讎二字成词是在西汉，有具体的解释，也当以此为始。清代学者对这段话又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。臧琳《经义杂记》卷三“刘向校书”条云：

今人校书，皆一人校其上下。据《风俗通义》知刘子政用二人对校。盖一人并看两本，恐有漏略，故一人读书，一人持本。视听两用，庶可无失。然犹虑有音同文异者，故必一人先校。此校讎之不同，然阙一不可也。

周寿昌《思益堂日札》卷五“讎校”条也云：

今人校书，皆一人校其上下。据此，讎书若今之对读矣。俗误以校讎为一事，失考。

臧、周二家，都把“校”和“讎”看成二事。这种推断，是不恰当的。刘向《别录》所言，只是指出校讎的方法有二：一个人独自进行的，叫做校；两人共同进行的，叫做讎。今



人称为校对，即古人称为校讎。至于校对二字的组合，很可能是后人嫌讎字不雅，而任意更改的。其实对、讎二字，具有同样的意义。因校讎之讎，当以讎为本字。《说文》：“雥，双鸟也，从二隹。”双鸟为讎，引申其义，二人也可称讎。凡物成双，也可称对。所以校讎称校对。一人独校，或二人合校，目的和功用是一致的，都在改正书籍文字的错误。实际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。但古代校讎的涵义并不局限在这样的狭窄范围里。因为整理书籍，第一步是求，第二步才是校，况且还有第三步、第四步的工作，那就是给书的内容作评介和给所有的书籍作出有系统的分类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

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

这就是评介的工作。这中间不但简括地介绍了书的内容，也评议了这些内容的得失，同时还做了一部分书的辨伪工作。

如现传的刘向《晏子书录》云：

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云：

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，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。故有《辑略》、有《六艺略》、有《诸子略》、有《诗赋略》、有《兵书略》、有《数术略》、有《方技略》。

这就是分类的工作。刘向父子给中国整理书籍的工作做出了一个典范：有了分类和评介工作，就给予学者研究某种学问时寻求资料提供了莫大的方便；有了文字的校正和真伪的鉴别，就能使资料确实可靠。而分类和评介工作倘若做得很

好，自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很有价值的学术史料。因此，后来有些学者，主张从大处着眼，要使整理书籍的工作能够达到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要求，他们把这个工作就叫做校讎。宋代郑樵的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，就用“校讎”这个名称来指以寻求、考辨、评介、分类为手段，以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为目的的治书工作。以后则校讎的范围愈来愈广，举凡搜集图书，辨别真伪，考订误谬，次第篇章，厘次部居，以及书籍的装潢、保藏、流通等，举凡一切治书事业，均在校讎范围之内。甚而编纂、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，也都由校讎学家担负了起来。因此，在我国古代，无所谓文献学，校讎学也成了文献学的别名，故范希曾在《校讎学杂述》中说：

细辨乎一字之微，广极矣古今内外载籍浩翰。

其事以校勘始，以分类终。明其体用，得其颉理，  
斯称校讎学。

清末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二，谈到校讎时也说：

目录校讎之学，所以可贵，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。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为目录，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。多识书名，辨别版本，一书估优为之，何待学者乎？

张舜徽教授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一期《华中师院学报》的《中国校讎学叙论》一文中亦认为，校讎“实际上包括了版本、校勘、目录三方面的内容。这三者便是校讎学的具体部分。假使缺损其一，都不能成为完整的校讎学。我们只看刘向、刘歆、郑玄、陆德明等几位大家在校讎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，便可知道校讎学的范围有多广大。”故此张氏在《广校



《校勘略》一书中大胆地肯定了校讎学的具体内容，着重指出必须合校勘、版本、目录三者，始可称为完全的学术。但这样的校讎全材，古今皆不多。因此，私家讎理图书，或专勘比文字异同，或专记版本，或专编书目，各得校讎学之一隅。于是，整个的校讎学，散而为校勘之学，版本之学，目录之学，派分门立，而皆冒以校讎之名。到了清代乾嘉之世，目录、版本、校勘都各自堂堂皇皇的挂起招牌，纷纷脱离校讎学而独立，这也是时势所必然的事。

讎校一词，出现也早。《文选》左思《魏都赋》即有“讎校篆籀”之句，可知“讎校”一词，西晋已有。与校讎的意义和范围相同。

校字的意义如前所述，勘，《说文解字》：

勘，校也。

《玉篇》：

覆定也。

指复核审定之意。但“校勘”之名，最初见于何书，还难以考证。只知《沈休文集》说：

宜选史传学士谄究流品者为左民郎、左民尚书，  
专供校勘。

唐朝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四《定谥》：

太常博士掌谥，职事三品以上薨者，故吏录行状，申尚书省考功校勘，下太常博士拟议讞，申省；省司议定，然后闻奏。

《北史·崔光传》：

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、刘燮等校勘石经。



由此可证校勘两个字在梁代以后才出现，但似乎并不很通行。唐时韩愈在他的《秋怀》诗里说：“不如覩文字，丹铅事点勘。”仍把勘字当作校正文字讲。后来清人陈景云校《韩集》，称为《韩集点勘》，欧阳泉也有《点勘记》之类，其源则出于此。元和年间人王初有《送陈校勘入宿》诗，见《全唐诗》卷十八。而《唐书·职官志》只有校书郎、校理、校理官等官职。到了宋代，校勘这个名称就比较通行了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：太宗时崇文秘阁的书被毁于火，残存的迁在右掖门外，“命重写书籍，送官详覆校勘。”校理官书的官属有馆阁校勘。欧阳修《书〈春秋繁露〉后》道：“董生（仲舒）之书流散不全，方俟校勘。”宋代所谓校勘，也是包含文字校正和考辨、评介、分类等工作的广狭两义的。欧阳修于仁宗景祐年间任馆阁校勘时，就参加了整理三馆和崇文秘阁书籍的工作，和王尧臣、聂冠卿等人编成一部《崇文总目》，现在他的集子里还保留着一卷《总目》所录诸书的叙论。到了清代，校正书籍之风大盛，何焯、陈景云、卢文弨、顾广圻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俞樾、孙诒让等都是校勘名家，而阮元又和他的几个助手编著了《十三经校勘记》这样一部大书。同时校勘的意义已进而为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”这样似乎自然而然地有了一个默契：“校勘”和“校讎”分了工；前者一般指文字的校正，后者则与目录学相当。虽然有时还把“校讎”当作校正文字用，但把“校勘”当作全部治书过程或目录学的情况却不大见到了。

“校勘”是两个同义的单音词所组成的双音词，但有其特殊的含义：广义的“校勘”，则包括古书的辨伪、辑佚及书目的校理，如张心勳的《伪书通考》、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



辑佚书》、宋代的《崇文总目》、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等，与“校讎”和“讎校”的内容完全相同。狭义的“校勘”则专指对同一部书，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，互相校对，比较其文字的异同。与我们今天所谈的校勘内容相似。同时，今天我们所说的“校勘”与“校对”二者从字面上看意义相似，但不完全相同，也还有区别。比如写好一篇文章，请人誊抄，誊抄过程中难免抄错，必须要用原稿校一遍，通过校的手段来改正誊抄中的错误，就叫“校对”。又如一本书要出版，先由排字工人根据原稿用铅字排版，有些字亦难免排错，打出校样后要用著者原稿校几遍，这种校法，也只能叫“校对”，不能叫“校勘”。至于校勘，一般是对古籍整理而言。古籍流传至今，和现代人的著作比较起来，具有两个特点：

1. 所谓古籍，一般是指从先秦到清末的著作。其中明代以前的人，其著作的原稿绝大部分都失传了，只有个别明人著作和少量清人著作还留有原稿。有原稿还好办，没有原稿就不能象出版今人著作那样根据原稿来排印，来核对。

2. 流传下来的古籍一般都是刻本和抄本，此外还有用木活字、铜活字、泥活字排印的活字本。即使是善本，其文字上的差错也不少。再则古籍流传，往往不止一种刻本或传抄本，且各种刻本和传抄本在文字异同、内容多寡上，往往互有不同，究竟取哪个本子来排印为好，只有通过校勘来解决。

因此，古籍校勘，就是在既没有原稿可作依据，流传的本子又多错误异同的状况下所必须做的一道工作。虽说校对和校勘都是改正原稿的错误，但一个是今，一个是古，一个



难度小，一个难度大。

古书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以前，皆为写本。晚唐以后，雕版盛行，一般书籍都有了刻本。刻本一出，传播的范围广，得书容易，好的古写本也就逐渐失传。书籍有了刻本，固然便于流传，但是刻书所依据的底本是否为足本、善本，刻版的时候曾否根据别本仔细校对过，有无错字等等，都是问题。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，刻书既多，且同一种书还有不同的刻本，卷数多寡或有不同，版刻也有精粗、美恶之分。官刻本或家刻本经过用心校对，一般来说错字较少；书坊所刻，为急于谋利，往往校订不精；而且书籍屡经翻刻、传抄，帝虎鲁鱼，错误滋繁，已变其原著的本来面目。所以从南宋开始，学者已重视版本文字的校勘。如岳珂刻《九经》、《三传》，曾广聚众本，订正讹谬，所刻《相台五经》最为知名。有关校雠学的专书，始于八百多年前南宋高宗时的郑樵，也就不是偶然的了。

元代所刻的书，也有不少胜于宋刻的，但种类不及宋刻之多。到了明代，宋、元刻本流传日稀，于是翻刻宋、元本颇为盛行。惟明人遇古籍不懂处，每每以意校改，反多讹误。刻本不同，文字也大有出入。因此读书不能不讲求版本。明、清两代藏书家辈出，如范钦天一阁、毛晋汲古阁、钱谦益绛云楼、黄丕烈士礼居、黄虞稷千顷堂、吴騫拜经楼等，家家竞购宋、元旧本，风靡一时，版本之学由是而兴。书籍既讲版本，就离不开校勘以判断文字的是非，正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卷十六中说：

古书传习愈希者，其传抄踵刻，讹谬愈甚，驯致不可读，而其书以废。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勘之。校





勘遂成一专门学。

可见校勘和版本是一对孪生的姊妹，是随着版本学的建立才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有理论、有方法的学问。

校勘学是研究校勘和与校勘有关的问题的一门科学。它既研究狭义的校勘，也研究广义的校勘。广义的校勘就会涉及到目录学、图书馆学、版本学等。本书所谈的校勘学是以狭义为主，如古书为什么要校勘、校勘的对象、校勘的历史、校勘的目的和要求、校勘的条件和方法等，但也牵连到辨伪和辑佚。因为辨伪、辑佚和校勘三者必须互相联系，不可分割，才能发挥它们恢复古书本来面目的作用。求古本之真，少不了这三项工作，所以要结合在一起谈。

## 第二节 校勘是整理古籍的基本环节

整理古籍，包括断句、注释、今译等，但都要先进行校勘，否则断句、注释就会断错、注错，从而也会译错。为什么要先进行校勘呢？因为古书中的文字往往有错误，使人难读难解，产生歧异，遂以一字的是非，引起学者 哓哓的争辩；校正后，原文才文从字顺，可读可解了。可见校勘这一工作是整理古籍中必不可少的工序，否则标点、注释等工作也只能是以错传错，以讹传讹，不能有益于读者。如《荀子·天论》。

耜耕伤稼，耜耘失岁，政险失民，田秽稼恶，余贵民饥，道路有死人：夫是之谓人袄。政令不明，举错不时，本事不理：夫是之谓人袄。礼义不修，内外无别，男女淫乱，父子相疑，上下乖离，寇难并至：夫是之谓人袄。袄是生于乱，三者错，无安国。其说甚

